

人權文化下的博物館：
社會參與博物館實踐之崛起、形式與倫理¹

Jennifer Carter²著

施彥如³、丁巧如⁴譯，陳佳利⁵審校

Museums in a Culture of Human Rights:
The Rise, Forms and Ethics of a Socially Engaged
Museological Praxis

Jennifer Carter

Jennifer Shih & Qiao-Ru Ding trans. / Chia-Li Chen reviewed

關鍵字：行動主義、歷史正義、人權博物館、紀念館

Keywords: activism, historical justice, human rights museum, memorial museum

¹ 此篇文章為 Jennifer Carter 博士改寫自她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所舉辦的第八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記憶所繫之博物館：再現、傳承與遺忘」中的專題演講。作者特別感謝陳佳利教授及研討會委員會的邀請，同時也感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的張容慈、謝宇婷，以及譯者施彥如的協助。

² 本文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藝術史系教授兼任博物館學程主任。

Director, Études Supérieures en Muséologie / Professor,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art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³ 本文譯者為專業英語口譯譯者，Email: jennifer.shih.carson@gmail.com

⁴ 本文譯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Email: ghosthithewall@gmail.com

⁵ 本文審校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摘要

本篇文章檢視 20 及 21 世紀，歷史正義和人權議題在博物館中的崛起。在人權博物館的演變中，共有三波浪潮，作者以紀念館理論為基礎，提出人權博物館的發展源自紀念館，其後，人權博物館與紀念館在博物館學中便一同前行。有鑑於主要個案研究中，跨地緣政治脈絡光譜和歷史正義範例的論述、博物館誌、博物館相關使命的轉變，作者提出了一新的博物館類型學，並在不斷發展的當代人權文化脈絡下，討論其出現之意義。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ise of historic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in museums throughout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Tracing 3 waves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rights museums, the author builds on theories about memorial museums to suggest that human rights museums have both developed from and alongside this earlier typology. Considering discursive, museographic and mission-related shifts in key case studies across a spectrum of geo-political contexts and historical justice paradigms, the author describes this new museological typology and situates its emergence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an evolving and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culture.

本文首先回顧「記憶所繫之博物館：再現、傳承與遺忘」研討會的主題，並簡要介紹其中幾個在博物館學和人類學、批判理論、社會學、文化研究和記憶研究等相關學科的討論中都具有重要性的語彙。⁶

所有的博物館都以某種形式和記憶相關連。當我們拆解這些在當代想像中往往被一併討論的術語，乍看之下，博物館與記憶似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然而，對博物館和記憶的深入研究正處在多元交匯點上，學術界以多種方式理論化這些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質疑博物館和記憶這兩個概念在博物館空間內如何相互作用⁷，並回顧「博物館」一詞的引用，遠超越了建築實體所定義出的博物館概念。

引起筆者興趣的主要理論架構有二。首先，是關於將記憶視為內容的這個概念，意即，記憶涵蓋於博物館中，且在博物館策展及設計的專業考量下，以某種形式被再現及擴展成符合展示的模式。被展示的記憶以某種方式呈現過去(Huyssen, 1995)，同時也可能觸發或喚起觀眾個人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關注的第二個架構便是博物館運用參與策略來影響觀眾理解物件以及展覽整體的同時，在博物館內具有個體能動性及詮釋權的觀眾，如何理解記憶。

博物館作為人類及自然世界檔案館的比喻，在博物館學文獻中反覆出現，而正如 Crane(2000: 4)所言，博物館為後代而保存的概念，證實了博物館本質上是保存記憶的容器。然而從蒐藏的有限性到博物館再現的政治性（決定什麼主題可以被呈現，以及如何被呈現），都充斥著道德難題。什麼

⁶ 目前有許多廣泛且不斷增長的文獻檢視討論博物館結合記憶的現象。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 Huyssen(1995)的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Crane(2000)的 *Museums and Memory*、Lehrer 等人(2011)所編輯的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Violent Pasts in Public Places*、Hirsch(2012)的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以及 Arnold-de-Simone(2013)的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等書。

⁷ 有關博物館與記憶之關係的深入討論，詳見 Crane, S., 2000. Introduction: Of Museums and Memory. In: Crane, S. (Ed.),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pp.1-1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可以成為博物館中的記憶？作為博物館專家學者，我們深知博物館是當代透過再現以形塑集體記憶的多元媒介之一，Crane(2000: 3)便提及博物館呈現的記憶不只靜態地表徵時間和地點，也依賴在策展過程中所決定的聲音、所做的選擇以及脈絡關係之中。

不同於前者，第二種理論架構則討論在博物館場域中，觀眾當下所產生的記憶。如 Crane(2000: 1)所表示：「記憶並非被動的過程」，不但「喚起情感及欲望，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亦在參觀博物館的經驗中由觀眾主動建構（這對於理解博物館場域中物件如何作為記憶的觸發器是重要的），記憶並非靜態或固定，而是流動且具關連性的。因此，受博物館制度化策略影響的同時，記憶在觀眾的博物館經驗中被生產。這是博物館的兩個基本隱喻。

當博物館處理困難記憶(difficult memory)時會發生什麼？例如那些與暴力歷史、濫權、人類苦難以及違反基本人權有關的議題；而策展人又該如何再現那些進行式或是具爭議性的記憶，如政治動盪、不安定的緊張局勢等尚未解決而仍待處理的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博物館再現困難記憶充滿挑戰性，但同時也具備可能性。不同類型的困難記憶需要被釐清，第一種記憶之所以困難，在於其喚起主體感知如濫權或人權侵害等痛苦，第二種則是因為那些記憶挑戰、擾亂或破壞主體對於世界之認知。後者的情況中，記憶並未強化觀者「認為」自己已知之事物，反而破壞了其穩定性，由此產生的新知識複雜化了觀者所想像的世界樣貌。

教育學者 Britzman 和 Pitt(2003)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理論化「困難知識」(difficult knowledge)的概念，他們探索接觸困難知識時的挑戰，例如在歷史創傷中，區分主體的先備知識和使其立場或信念有所動搖的知識，更從教育和學習的雙重視角中考量困難知識的內容和再現的危險性。

近期，這個概念被博物館學者應用於策展中，並討論這樣的公共行為如何為大眾參與呈現困難知識。批判教育學者 Simon(2011a: 195)仔細闡明這

些區別，指出：

所謂困難知識，並不固有於特定的文物、圖像和論述中，意即，不應將困難視為特定知識本身的特徵或屬性。更確切地來說，在困難知識中困難的軌跡刻劃在不確定但可能存在問題的關係中，困難知識與觀展經驗所激發的情感力量、觀眾體驗這種力量的可能性及其對展示圖像、文物、脈絡及聲音的理解相關。

上述引文中，Simon 認為除了關注歷史敘事中物件的能動性(agency of objects)，同時也須理解物件如何藉由感官記憶激發情緒，以影響觀眾的思考過程、判斷和行動，由此強調博物館的雙重性。

記憶如何與博物館及展示中的詮釋機制互動，一直是博物館工作中的重要討論。博物館的策略是有助於開放或是增強、是穩固亦或擾亂個體和集體記憶？這些策略在什麼樣的脈絡及意義下做到這一點，又導致什麼結果？有爭議的或未達共識的記憶如何在博物館及展覽的困難主題中呈現？誰又得以發聲？在這類展覽中，博物館策略究竟是限制了再現，亦或是引發個人及社會轉型、產生政治行動的能動性？

阿根廷社會學家 Jelin(2003)提出「記憶勞動」(the labors of memory)。借鑒於精神分析理論，她認為記憶是一種工作形式，是活躍的、有效用的、變革性的，願意勞動記憶的人會獲得「成為道德和政治代理人的可能性」(LaCapra 原著，Jelin 引用，2003：6)。澳大利亞博物館學家 Witcomb(2013: 267)亦提出類似觀點，探討展覽如何使觀眾「在深入參與展示及其內容、物件／裝置的過程中產生情感及知識勞動」。

關注保存(curating)困難記憶或困難知識需要一種特殊的關注形式。curation 這個詞，源自 curare，意即照顧。教育學家 Lehrer 和 Milton(2011)便在《困難知識的保存》(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一書中提出困難知識的教育實踐所需的敏感性。儘管處理困難議題的博物館在近年來大量增加(Williams, 2007)，然而作為殖民計畫之一環的國家博物館，早於 19 世紀便

試圖以浪漫主義或同質觀點來呈現國家歷史，世界各地許多博物館皆在其早期展覽中廣泛採用殖民者的觀點。今日，在這些博物館中，館員應用去殖民化之理論，並與原住民及少數族群合作，對過去呈現更準確、細緻和多元的敘述，從而再現這些在傳統中被排除在博物館敘事之外的聲音。⁸

一、人權、歷史正義及公共領域中人權博物館的興起

在討論這些作為博物館學批判實踐思潮之語彙時，需注意到一個特定現象——當代社會中，人權實踐及論述的文化崛起。人權實踐及論述體現在博物館中，而博物館在全球地緣政治背景下，具有解決不義歷史的特定使命。

Neumann 和 Thompson(2015)指出，雖然人權和歷史正義的概念大多自二戰後發起的法律訴訟發展而來，但很多學者認為當代大規模紀念人權受害者和平反活動，遠超出人權概念發展的第一階段，也就是 1940 年代的報復性正義、懲罰加害者的概念。1990 年代，人權概念之特性從報復性正義轉向修復式正義，同時亦關注受害者⁹。具體行動包含成立道歉和真相委員會、藉由揭露真相和加害者自白等方式，公開承認錯誤行為，實際案例則如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各地出現各種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真相與正義委員會。

在人權概念發展的第二階段中，博物館扮演了關鍵角色。在過去的世代中，隨著歷史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博物館採用了實踐教學法，不僅使遭受不正義的受害者得以發聲，並利用倡議言論和概念推動國族建構，筆者認為這也影響了於 1970 年代興起，根植於地方和跨國性的人權運動。

將人權和歷史正義之論述注入公共記憶，與美國歷史學和法律學家 Moyn(2010, 2014a, 2014b)所提出的人權「人道主義模式」(humanitarian

⁸ 詳細案例請參照 Phillips, R., 2011. *Museum Pieces: Towar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anadian Museum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⁹ 關於歷史正義的興起及其報復和賠償正義階段的這一特殊說明，請參見 Neumann&Thompson(2015: 8; 17)。

paradigm)一致，這是他所描述的、自 1948 年聯合國制定世界人權宣言後，人權的三波浪潮中的最後一種模式¹⁰。Moyn 指出人權並非總是帶有人道主義的意圖，揭穿了長期以來有一種未分化的普世人權神話之真相，並針對人權的概念演變中提出了三種模式。而最晚近的、當代對人權的理解，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並在跨國議題中體現——如人類暴行和濫權事件。1970 年代，人權論述及實踐的大規模崛起，可以在根基於地方、以民間為主導的行動中窺見，如 2007 年創立的倡議社群 Avaaz 和公益網站 Change.org、2012 年成立的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和不再旁觀(Idle No More)等。同樣也見於跨國組織的工作中，如 1945 年創建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 1998 年成立的國際刑事法院。當代的人權概念，在非政府組織中十分活躍——如 1961 年在英國創立並於 1977 年榮獲諾貝爾獎的國際特赦組織，將焦點轉移至全球規模的暴行預防，以 Moyn(2014a: 94)的概念而言，即是人權的全球理想主義模式。

人權概念對於博物館的重要性，與 1980 年代以來大量出現的紀念館相互呼應，並且一直持續至今。在博物館中，人權議題的發展歷史可定義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 1950 年代，具紀念功能的紀念館之出現¹¹，這一階段中，紀念館透過再現與大規模侵犯人權相關的事件來討論人權概念。致力於歷史主題的紀念館，為博物館導入了新的社會角色，使博物館成為記憶的機構，並對傳統的蒐藏功能和策展理論產生衝擊(Arnold-de-Simine, 2013)。1955 年於日本設立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1962 年於塞內加爾開放參觀的格雷島奴隸城堡(Senegal's House of Slaves in Dakar)、以及 1980 年成立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都屬於第一階段發展的人權博物館。

第二波的紀念館浪潮擴大了原初的概念，透過對比和當代議題再現等

¹⁰ 在其人權史學中，Samuel Moyn 描述了 1940 年代的國家福利主義模式、1960 及 1970 年代的反殖民模式，以及 1970 年代的人道主義模式。

¹¹ Williams(2007)於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一書中，詳細追溯了紀念館發展的歷史軌跡。

手法，為種族滅絕或奴役等人權議題提供更廣泛的觀點。在這所謂的第二波浪潮之下，比較性的視角並非博物館原先所計畫的，因此通常被呈現在後來增加的小型展間中。有趣的是，這些新展間往往因其有關當代之內容、論述、展示設計的轉變等特色而突出，例如使觀眾沉浸在創傷中的場景、嚴肅的媒體化展示、借鑒人權實踐的論述，並鼓勵觀眾積極參與。第二波紀念館於 21 世紀早期開始發展，其中，顯著的案例包含 1993 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開館的猶太浩劫博物館(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於 2009 年開放的「由記憶至行動」(From Memory to Action)¹²展，以及 2007 年在英國利物浦開館，並於 2012 年推出倡議區(Campaign Zone)的國際奴隸博物館。

第三波則由一群新的、以人權為使命及活動核心的博物館所組成，有些博物館更將人權一詞納入館名。當中發展較早的是於 1985 年設立的大阪人權博物館 (Liberty Osaka，或稱為 Osaka Human Rights Museum)。更晚近的案例則包含 2014 年成立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以及於 2016 年在臺北迪化街開設、致力於倡議臺灣「慰安婦」議題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和 2018 年開館，包含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和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

人權博物館的增長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後千禧年現象，除了日本。日本早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就成立了與第三波浪潮類型相符的人權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的規模、行政層級和倡議範疇皆有差異，例如其公私立身份及其作為自由民主國家、後獨裁社會、或受派系影響的政治制度之產物，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地緣政治背景下，人權博物館產生的因素及其在博物館學中的定位也不同。從國家機構到社區博物館，這些博物館所處理的議題，以至機構所發展的計畫，也具備差異及多元性。因此，無論是以法律、社會文化、政治歷史或是跨學科理論架構作為知識論基礎，在與人權議題之互動中，博物館策

¹² 此為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在全球脈絡下處理當代種族滅絕及人權侵害議題的系列展中的第一個展覽，該展覽現(2019)已結束。

展、教育和整體制度都將持續蓬勃發展。

二、第一波浪潮：紀念館的崛起

博物館工作近年來的轉變，與日本在 1955 年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紀念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相關。紀念館透過強調並紀念受害者，及其所遭受的痛苦，來再現暴力歷史和濫權事件，如同 Williams(2007: 8)在第一本分析這種不斷發展的博物館類型之專著中所論述的那樣，將紀念館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博物館，致力於紀念特定大規模受害的歷史事件」，他同時提及：

紀念館帶有與生俱來的矛盾性。即便紀念碑¹³涉及政治性，至少在歷史這個避難所中是安全的。由於對亡者的真實評價往往被視為不敬的，所以不管人們的真實事蹟為何，大多數人都會獲得榮譽。與之相反的，歷史博物館則被認為與詮釋、脈絡化以及批判相關。而上述兩者的結合，表示人們希望在道德框架下敘述可怕的歷史事件，並更深入地對紀念行為進行脈絡化的解釋。因此，近期許多紀念館——例如在阿根廷、紐約、盧旺達的紀念館，政治化其自身的行為時，同時也顯示了令人不安地、紀念與批判詮釋概念之共存。(Williams, 2007: 8)

世界各地近期廣泛拆除紀念碑，這突顯了博物館和紀念碑都涉及政治性。上述 Williams 的觀點也提醒我們，紀念館致力於保存及再現過去的同時，亦具有形塑集體記憶之潛力。紀念館多元化地策展困難議題，揭示了博物館在處理不同地區和脈絡的創傷歷史時，對於呈現認同和紀念政治性不同態度之轉變。伴隨著學術界對批判記憶研究(critical memory studies)的擴展，在 1980 年代湧現的紀念館，也於其博物館實踐中，連結新形式的記憶論述，

¹³ 審校者註：這裡 Williams(2007)使用的是 memorial 一詞，譯者根據上下文意涵，翻譯為紀念碑。在該書中，memorial 一詞涵蓋有形與無形的紀念行為或物質，如紀念日、紀念儀式，或紀念館與紀念碑等。

並蒐藏、保存和呈現大規模濫權下的受害者，成為當代博物館的跨國性主題。博物館展示以各種展示方式呈現受害者生命故事（如物件、口述史和錄影），象徵性地修復其道德與尊嚴，成為這些博物館最重要且最有意義之目的。許多紀念館員為受害者發聲，透過釐清物件所有權及其相關的生命故事，將人的維度重新置於館藏物件之中。博物館為受害社群發聲，並影響更廣大的社群，成為這些博物館價值的決定性特徵。

除了獨特的蒐藏架構之外，紀念館還開發特定的方法來吸引觀眾，意圖超越時間和空間，讓觀眾和歷史事件距離更近。若博物館並非位於創傷事件發生的歷史遺跡上，則經常使用類比博物館學(analogical museography)¹⁴，藉由裝置和敘事克服空間及時間距離，使觀眾感知博物館所再現的非常狀況。對於再現人類苦難和歷史記憶，這種形式的展示設計特徵在於其相當程度地不只仰賴觀眾以其概念和觀念來認識展覽內容、也透過現象學式的主觀認知，來體驗博物館所要呈現的創傷經驗。

坐落於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中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是為了紀念 1945 年 8 月 6 日的廣島原爆而設立。作為第一座紀念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是博物館學中新的類型典範；而簡要分析該館過去的展覽內容，可以發現在博物館學架構下，其歷史再現哲學之演變。該館於 1955 年開館時，展示呈現當地居民組織「原爆資料集成後援會」（今原爆資料保存會）所蒐藏的、原爆相關的系列物件¹⁵。十多年來，民眾自城市中蒐集、如同 Schäfer(2008)所言的「標本」，成為寫實地向觀眾傳遞原爆事件的具體方法。當地民眾及原爆倖存者前往位於紀念公園西側的博物館悼念所失去的同時，亦用個人蒐藏的遺物豐富資料館館藏，此舉呼應該館作為「蒐藏資料」之意涵(Schäfer, 2008:

¹⁴ 類比博物館學是由博物館暨藝術史學家 Raymond Montpetit 所提出的理論化的概念，提及博物館立體模型和其他在展覽空間內複製現實的景觀技術。詳見 Montpetit, R., 1996. Une logique d'exposition populaire : les images de la muséographie analogique. *Publics et Musées*, 9(1): 55-103.

¹⁵ 見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網路資料：

http://hpmmuseum.jp/modules/info/index.php?action=PageView&page_id=67&lang=eng（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7 日）

159)。而正如 Schäfer (2008: 161)進一步論證的，這些物件不只帶有過去的印記，「同時也是對未來負起責任的遺產」。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在 1970 年代進行第一次更新，特別藉由重建寫實性(realism)來彰顯現實。如同 Schäfer (2008: 160-161)所指出的，該館著重如何再現原爆受害者，例如引進現實感較強的人物蠟像，而非延襲人體模型的使用，並在複製物件時特別留意輻射的物理影響。充滿姿態或忙碌行動的人物、取代了那些靜態的人像，嚴重燒傷的身體則傳遞了官方所期望的，更具說服力的苦痛真確性，這樣的展示手法使得沒有經歷過廣島原爆的外國觀眾能夠在情緒上有所共鳴。重視突顯受害者經驗的展示設計成為紀念館共同的特色，然而，在記憶政治的作用下，不同館舍在目標觀眾的設定、引發觀眾情感的展示手法上各不相同。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應用這種不斷演變的類比(analogical)展示手法，刻意地將觀眾置於徹底受摧毀的後原爆景觀當中。以地緣關係而言，該館由東京建築師丹下健三所設計建造的現代主義建築，僅距美軍於十年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原爆點「原爆穹頂」(登錄於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短短幾公尺的距離。歷史學家 Giamo(2003: 704-705)便指出，要求觀眾對於事件的沉浸式體驗，表明了資料館紀念緬懷「史上最初遭受原爆浩劫」受害者的同時，旨在向國際社會發出慎重的信息。因為廣島市長在戰後倡導核和平主義，並積極地將廣島定位為和平紀念城市，因此資料館在更廣泛的脈絡下，也是作為和平建設之一環。

1990 年代中期，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在展示更新的過程中，討論了擴大敘述之必要性，認為應該對過去採取更加結構化和批判性的觀點——例如脈絡化廣島作為重要軍事地點及其如何成為原子彈攻擊的目標，而非將敘述限制在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或單一化歷史事件 (Schäfer, 2008; Giamo, 2003; 廣島和平資料館¹⁶)。處理不同社群間的困難知識及其分歧，成為由地方、且

¹⁶ 見廣島和平資料館網路資料：

為地方所發起的博物館敘事不斷變化之基礎(Schäfer, 2008)，其中，歷史修正主義、更廣泛的國家論述以及普世的和平概念，正展開競逐¹⁷。從廣島紀念和平資料館全面關注受害者的痛苦、廣島作為致力於和平建設的城市，以及脈絡化戰爭中廣島的軍事角色等方面，可以發現該館在紀念暴行受害者，以及支持禁擴核武和平運動的雙重框架下倡議人權議題。

三、第二波浪潮：由紀念到行動主義的博物館

近年來，新的論述注入紀念館和其他類型博物館的主流敘事，敘述除了集中在遭受歷史和社會不正義的受害者故事，及其抵抗不正義之韌性，也將焦點置於相關的倡議社群。某些情況下，歷史正義、人權論述與紀念相互結合，使得全球各地的博物館基於共同的使命，開始採用新策略，教育並提高社會大眾對文化、宗教及族群歧視的零容忍。在這些博物館中，對於侵害人權、回復歷史正義，以致公民行動論述的集體和個人記憶正被喚起。

在博物館中採用人權框架意味著透過展示文本傳達自法律術語中挪用的人權理論和概念，以及由社群主導的展示或人權教育之社會實踐。博物館可以產生特定的倡議語言，就如同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在展示中具體的行動呼籲，或是像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猶太浩劫紀念館(Montreal Holocaust Museum)，便透過邀請有影響力的博物館並借重其專業知識，對當代特定議題表明博物館立場——譴責種族滅絕或支持難民權利。在這些方式中，人權及歷史正義並非簡單地被嫁接至紀念館中的博物館學理論傳統，相反的，它們隨著不同的意圖和實踐而演變，不僅造就了重要的論述轉變，並可能使觀眾由目擊者轉化為人權運動的倡議家。

http://hpmmuseum.jp/modules/info/index.php?action=PageView&page_id=67&lang=eng (瀏覽日期：201年3月17日)

¹⁷ 審校者註：廣島和平資料館為廣島市政府所支持營運的博物館，因此除了館方的策展觀點外，也受到地方不同社群的意見及力量所影響。另外，如本文作者所言，國家的論述、歷史修正主義及普世和平主義等觀念，也對展覽變更產生影響力。

最近有些紀念館活動計畫變化，便是受這些論述轉變之啟發。一個關鍵的案例是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該館於 1993 年 4 月，由當時的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宣告開館。透過獨特的建築隱喻、沉浸式展示場景、開創性的活動設計、以及為猶太浩劫研究提供平台，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不僅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和紀念館中具有其指標性，亦成為全球其他猶太浩劫紀念館實務工作之參考基準。2009 年新增的「由記憶至行動」展¹⁸，不同於大屠殺敘事以傳統線性時序呈現歷史軌跡，其三方敘事觀點標誌了博物館論述及策略的創新。從展覽的標題《由記憶至行動》以至展示內容，不僅讓觀眾感覺必須採取行動，更建議觀眾具體行動之方式。該展由 Bridget Conley-Zilkic 所策劃，他不沿用博物館常設展中的案例，而是以歷史為基礎，與發生在盧旺達、達佛、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等地的當代種族滅絕事件相連結，從教育和明確的行動主義觀點，界定「種族滅絕」的概念，引發廣泛的討論。

筆者認為，《由記憶至行動》展是博物館新類型學的先驅。該展覽反應了 Orange 和 Carter(2012: 112)所提及的人權博物館學中的一個基本議題：

在處理社會不正義的全球現象之下，與時俱進的博物館理論和專業實踐，根本地改變了博物館的工作形式及性質。人權博物館學認為博物館能在地方、國家和國際等層面，積極參與反侵犯人權的運動。這意味著博物館必須在政治性的議題上採取公開立場，這可能導致博物館與其資助者產生衝突。

在以下幾個方面，《由記憶至行動》展與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中的其他展覽有很大的差異¹⁹。常設展呈現猶太浩劫的全面性描述，並以類比的方式，

¹⁸ 可見作者另一篇分析該展覽之論文。Carter, J., 2016. Out of the Box and Into the Fold: Museums, Human Rights,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Gosselin, V.&Livingstone, P. (Eds.) *Museums and the Past: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Vancouver: UBC Press.

¹⁹ 見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網頁資料：

<https://www.ushmm.org/information/press/press-releases/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s-new-exhibit-from-memory-to-action->，以及

結合文本、物件及口述歷史，揭示納粹政權在大屠殺中的空間部署及進程。走到「由記憶至行動」展，醒目的標題強調了該展覽所倡議的行動主義，而敘事策略和展示設計上亦有所轉變。展覽中採用新的展示手法，關注發生在盧旺達、達佛、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等地的種族滅絕，呈現了地方和國際社會對種族滅絕的行動和反應，強調多重觀點和觀眾參與變革之角色。

《由記憶至行動》展的第一個空間中，將文本及照片編織成牆面，圍繞著觀眾，呈現種族滅絕關鍵階段及目擊者的敘述。而中心懸掛著的多個數位螢幕則為牆面的視覺拼貼提供聽覺對照，同時播放記者、人道主義者、倡議者、倖存者，甚至是事件中的主角對當代種族滅絕事件之敘述，多元觀點在此空間中得以並存。

然而，除了展示設計的變化，將觀眾定位為暴行的見證者，這個策略的使用也在改變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的紀念邏輯，迫使那些進入「由記憶至行動」展的觀眾採取行動，使「互動性」成為該區展示策略之核心。附屬網站、網路帳戶、數位觸控桌和可攜式承諾卡，全被設計用於延續參觀經驗以及展覽整體訊息：觀眾可以用承諾卡記錄數位觸控桌中的種族滅絕倖存者故事，亦能從家中檢索這些訊息。此外，觀眾亦可利用承諾卡宣示個人對於人權的承諾，加上經由網路獲得的、從世界各地傳來的宣示，會公開投放在展區中的大型螢幕上。該螢幕同時還兼具即時訊息，提供世界各地種族滅絕事件的相關新聞和資訊。

博物館藉由多元架構處理歷史正義，以及將觀眾定位為全球社群下的參與者，《由記憶至行動》展對於由紀念邏輯轉至行動主義的博物館學理論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四、第三波浪潮：人權博物館的初步反思

自 2000 年以來，博物館的第三波浪潮同時發展出人權文化。這些博物館透過論述和行動來處理視為其使命和任務核心之人權議題，這樣的發展是跨地域性的，臺灣、韓國、日本、印尼、比利時、智利、巴拉圭和加拿大等地的博物館成立就證明了這一點²⁰。

有些人權博物館之建構脈絡是因其國家發生的歷史暴行，博物館結合歷史記憶和人權觀點來處理這樣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博物館是在轉型正義機制中誕生——例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後獨裁統治、後武裝衝突社會的和平倡議，特別是在南美洲。有許多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的博物館，包括智利聖地亞哥的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以及巴拉圭亞松森的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o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這兩者都在暴力且漫長的獨裁統治之後出現。整體而言，這些博物館是由國家和地方發展而來，並超越了紀念功能，致力於社會療癒，不僅為受害群體及其家庭提供象徵層面及實質的賠償，亦與更廣泛的社會階層有所連結。在這類型的博物館中，除了呈現歷史性的主題（即便該議題為國家近期的歷史）之外，亦試圖涉及當代議題，例如位於亞松森的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便同時經由展示和活動，倡導巴拉圭原住民應有的公平待遇。

在國際人權論述及實踐和回復歷史正義的概念興起之下，這些博物館在當代背景下發揮著多重作用：為受害者提供發言權及其對賠償的要求、蒐集與分享知識及資訊、為賦權受害者和倡議社群建立聯繫網絡並增進交流、

²⁰ 雖然有些博物館在其名稱中直指其工作本質，但仍有許多以人權為核心的博物館並未在其名稱中明確使用「人權」一詞，例如在南非開普敦的第六區博物館(District Six Museu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在主席 David Fleming（前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群總館長）的領導下，自 2010 年以來，為廣泛的人權博物館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平台，網絡和論壇。透過年會及其他活動建立聯繫和交流，以處理全球人權議題。詳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網站：<http://www.fihrm.org>（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6 日）

提供文件——例如可作為證據的歷史檔案以作為個人和集體尋求真相之管道，並為國家及地方和社會的凝聚力構建敘事。

另一類人權博物館之特色在於其並非透過處理歷史正義和紀念，而是藉由認同政治或更廣泛的視角來處理人權議題，前者如大阪人權博物館，後者則如加拿大人權博物館討論「人權概念的演變、宣揚及其未來」²¹。這類博物館主要是為了教育大眾，使其認知歧視的危險性，並透過博物館內外的活動，倡導人權文化的重要性。

大阪人權博物館於 1985 年開館時，首先關注「受壓迫者的歷史」²²，特別是部落民。作為一個被高度污名化的少數群體，部落民被日本主流社會排斥長達幾個世紀，只因其工作（屠宰、皮革加工、葬儀）被視為是污穢的。在日本嚴格的社會階級制度下，部落民長期生活在被隔離的村莊。整個 20 世紀，日本的人權倡議團體如部落解放同盟，致力於教育人們理解歧視，並鼓勵基於人權概念的寬容精神。當民間團結起來創建專注於部落民議題的博物館，標誌出博物館可經由研究、學校計畫、展覽和演講等方式來提高人權意識，並支持日本及更廣泛的人權運動以解決歧視之潛力。博物館創建之初，得到部落解放同盟、地方政府（大阪市及大阪府）²³和私營企業的支持，於大阪南方浪速區中的一所學校舊址建館。博物館的選址具有其象徵意義，

²¹ 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網站，<https://humanrights.ca/about-us>（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3 日）

²² 見財團法人亞洲·太平洋人權情報中心網站：
<https://www.hurights.or.jp/archives/focus/section2/2009/09/liberty-osaka-promoting-human-rights-to-all.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²³ 現今當地政府取消了对大阪人權博物館的資助，並自 2015 年以來一直迫使博物館關閉，危及博物館生存。譯者註：作為財團法人的大阪人權博物館，在 2013 年以前，大半經費來自大阪府及大阪市政府挹注。2012 年 4 月，大阪市長橋下徹及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參訪大阪人權博物館之後，表示「展示內容專門呈現歧視和人權，無法帶給孩子夢想及希望」，因此於 2013 年 4 月起，取消了全數的補助金計 1 億 2000 萬日元。大阪市政府更於 2014 年表示博物館所使用的土地為公有地，要求大阪人權博物館於 2015 年「市有財產使用租借契約」到期後，開始支付一年 2700 萬日元的租金。2015 年 7 月 23 日，大阪市政府以土地使用問題為由，對大阪人權博物館提出法律訴訟。詳見大阪人權博物館網站：<http://www.liberty.or.jp/member/>、http://www.liberty.or.jp/cp_pf/index2015.html；律師.com 網站：https://www.bengo4.com/c_18/n_532/（瀏覽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浪速區包含過去部落民所居住的、在江戶時代以鼓製造業和皮革產業為中心的渡邊村²⁴。作為日本第一座、大概也是世界上第一座致力於人權的博物館，大阪人權博物館利用非物質遺產（部落民的音樂及舞蹈）、口述歷史和體驗式的展示手法來呈現部落民議題。

自 1995 年以來，大阪人權博物館擴大其理論和方法，處理與日本社會所顯露的歧視有關之多元人權問題，如關注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歧視、使觀眾認知捍衛 LGBTQ 權利之重要性、討論社會對北海道北部阿伊努族和在日韓國人的歧視待遇，並特別關注人們如何透過個人參與來抵抗歧視。

如果大阪人權博物館是以民間社群為基礎，以人權使命為中心的博物館案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則是一個在國家規模下發展，並作為國家級機構的例子。40 年來，加拿大僅創建二座國家級博物館，其中一座便是坐落於首都區之外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創建該館之構想由溫尼伯市的律師 Israel Asper 所提出，Asper 於 2003 年逝世之後，其家人繼續募款以籌建博物館。在多年醞釀之下，加拿大於 2008 年立法通過該計畫、將該館定位為國家博物館，並修改博物館法以納入最新的國家博物館²⁵。

加拿大人權博物館處理廣泛的議題，其任務為「探討（不限於）加拿大的人權問題，以加強大眾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增進對他人的尊重，並鼓勵反思和對話」²⁶。該館透過呈現全球視野下的人權，以及與人權相關的歷史關鍵時刻來達成任務，因此許多學者稱之為「觀念博物館」(an ideas museum)(Muller & Woolford, 2015)。加拿大人權博物館權衡廣大的時間及歷史範圍，挑選出歷史中特定的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如猶太浩劫，其他種族滅絕的例子亦被並列比較，然而，這些案例僅限於受加拿大政府認定者。

²⁴ 見財團法人亞洲·太平洋人權情報中心網站：

<https://www.hurights.or.jp/archives/focus/section2/2009/09/liberty-osaka-promoting-human-rights-to-all.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²⁵ 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網站，：<https://humanrights.ca/about/our-history>（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²⁶ 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網站：<https://humanrights.ca/about/mandate>（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採用如此狹隘的司法定義，其危險是顯而易見，並受到強烈的批評。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烏克蘭大饑荒、猶太浩劫、盧旺達種族滅絕和波士尼亞種族滅絕都已正式得到加拿大政府的認定，而得以呈現在博物館專門探討種族滅絕的展區內。然而，如學者們所指出的，這導致了苦難事件的競爭(Moses, 2012)。未受認可者，便在博物館中遺漏，甚至如加拿大原住民的文化滅絕，雖然在其他展示中呈現，但在該展區中亦明顯缺席²⁷。一個多世紀以來，原住民兒童被強行帶離家園，並被系統性地安置在寄宿學校，以灌輸歐洲中心主義和殖民地價值觀，意圖消滅其語言和文化。這些孩子中，有許多人遭受性侵犯，身體和情感虐待。沿著加拿大沿海一區又一區地聽取證言後，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 Murray Sinclair 法官於 2015 年裁定加拿大發生過「文化滅絕」²⁸。

很多人認為加拿大人權博物館處理和譴責這場「文化滅絕」的反應是

²⁷ 在博物館的展示中，確實敘述了 19 及 20 世紀全期，成千上萬的原住民兒童從家族和家庭中被移往教會和國家認可的機構中接受教育，以加拿大主流價值觀同化其認同，來暗示與寄宿學校系統相關的「文化滅絕」，但筆者於 2015 年到訪時，博物館本身並不支持在提及加拿大種族滅絕時，該術語的使用或合法性。據估計，在 1831 年至 1996 年薩斯喀徹溫省龐尼基的最後一所住宿學校關閉時，這些學校中，包含第一民族、因紐特族和梅蒂人的 150,000 名兒童入學，其中有 6000 名兒童死亡。

²⁸ 更具體地來說，委員會發現「住宿學校系統的建立和運作是應被描述為『文化滅絕』的政策之核心要素」。根據這項「政策」，委員會發現「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核心目標是消除其政府、忽視原住民權利、終止條約，並且，透過同化過程，使原住民在法律、社會、文化、宗教、社會實體等方面，不再是獨特的存在」。(網路資料，見：http://nctr.ca/assets/reports/Final%20Reports/Executive_Summary_English_Web.pdf，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6 日) 圍繞著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在提及加拿大原住民族群所受待遇時並未使用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之狀況，經過多年的激烈辯論和批評，在本文發表之際、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開地扭轉其立場，承認下述內容：「我們想和大眾分享，博物館確實認知到針對原住民族群的種族滅絕，並認為從初次接觸至今，其所有在加拿大被殖民的經歷都是種族滅絕。我們也一直在學習和成長。」(詳見：<https://www.cbc.ca/news/indigenous/cmhr-colonialism-genocide-indigenous-peoples-1.5141078>) 對於加拿大人權博物館於 2013 年首檔展覽中未能援引種族滅絕一詞，博物館聲稱其依靠法院及學術機構提供資訊，因而無法在提及過去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族群的不正義時正式使用此術語。見：<https://www.cbc.ca/news/canada/manitoba/human-rights-museum-sparks-debate-over-term-genocide-1.1400154>。自 2013 年以來，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2015 年 6 月公開) 和「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及女童全國研訊」(National Inquiry into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2019 年 3 月發布) 的兩份突破性報告書，在描述加拿大原住民族群所受到的傷害時，皆分別地使用「文化滅絕」和「種族滅絕」一詞。

遠遠不足的。雖然對這一重要問題的廣泛討論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但人權博物館在討論可能與過去或現在的政府政策不一致的權利時，會面臨許多挑戰，特別在其主要的財政支持來源為國家時，就如同國家博物館的情況。認知到博物館可以透過多元方式對自身實踐進行去殖民化，對移住民・原住民 (settler-indigenous) 之記憶及關係提供更公正的解釋，還只是起始階段。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必須更充分討論殖民地種族滅絕、殖民化的結構要素以及加拿大不斷發展的遺產。這些是人權博物館在保存、再現困難遺產和知識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經驗。

在此，藝術是展開對話和動搖困難歷史的標準敘述之有力途徑。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委託當代原住民藝術家 Rebecca Belmore 所創作、懸掛在「原住民觀點」展區中的宏偉雕塑作品「痕跡」(Trace)，說明了以藝術處理有爭議的歷史，如何有別於傳統教條式的展示。作品之雄偉風格由其物質要素構成，一個個由手工壓制而成的黏土珠子所「編織」而成的龐大毯子，帶出了隱喻的可能性。因此，作品能夠從多方面解讀，包含 Belmore 在更廣泛的藝術實踐中與她所探索的議題之關係。作品的第一個層次與領地及土地有關，這向來是原住民藝術中的重要主題²⁹。來自紅河谷當地的黏土，除了將藝術作品連結至地方，也就是博物館所在的、受原住民一號條約(Treaty One Aboriginal)規範之土地，更連結了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歷史。在建館之前的遺址挖掘產生的「痕跡」——數百件原住民考古文物，亦與 Belmore 作品相互關連。另外，毛毯具保護覆蓋物之意涵帶出更多議題，如原住民無家可歸的困境（這亦是社會不平等的關鍵問題之一），以及經由毛毯傳染而導致 18 世紀許多原住民死亡的災難性天花疫情。

²⁹ 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網站：

<https://humanrights.ca/news/renowned-canadian-artist-to-create-major-original-piece-for-cmhr> (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圖 1 加拿大人權博物館委託 Rebecca Belmore 創作、懸掛在〈原住民觀點〉展區中的雕塑作品「痕跡」(Trace) (攝影／陳佳利)

結論：前進的方向

以新思維方式思考權利的概念，可以超越法律範疇，並透過博物館工作來影響社會及政治變革，這樣的觀點為博物館研究及實踐開創了嶄新且重要的途徑，特別是在探討博物館學介入人權領域之影響及益處，例如動員觀眾持續參與人權議題。

整體而言，我們在博物館投注我們的希望，期望經由博物館工作帶來社會所需的變革，並產生影響力。如果人權概念在全球許多博物館中已佔有一席之地，那是因為博物館專業者相信博物館具有提升歷史意識、甚至批判

性地參與過去之能力——特別是涉及歷史不正義的過去。正如 Simon(2006, 2011b)所言，這些博物館的觀眾不單只是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也與持續發展中的遺產有所關連。儘管並非所有觀眾都會直接經驗到過去的暴行，但整理 Witcomb(2013: 264)的說法，博物館的工作有助於使我們意識到自身在「有關過去的敘述如何經驗」中具有影響力，而這需要透過幾個超越傳統教條教學的方法，使用隱喻、並列差異及美學概念，鼓勵觀眾批判性地參與並深入地反思行為。展覽設計的多元化也提醒我們，博物館敘事在同時引發觀眾感官和認知參與的重要性，以達到轉化經驗之可能性。

人權博物館的最終目標是改變權力濫用和人權侵害的行為，及對這些行為漠不關心的態度。在此前提下，連同真相委員會及加害者的謝罪，博物館可以成為補救歷史錯誤之管道。若許多博物館策展實踐的前提是使受害者和被剝奪權利的社群得以「發聲」(giving voice)，那麼人權博物館便可能驗證 Witcomb(2015)所提及的「感覺教學法」(pedagogy of feeling)，關注改變結構並創造「積極見證」的環境，從而引發具體改變。感覺教學法旨在破除「我們」與「他們」的二元論，以改變觀眾與博物館中展示它者間的關係，進而激發個人的轉變。這個過程類似於 Simon(2006: 188)所描述的，要求觀眾進入「負責任且紀念性的親密關係」(responsible memorial kinship)之展示。

批判地展示困難歷史，使這些博物館能夠回應其最重要的使命：成為容納多元聲音和對話以討論正義之場域，並在可能動搖觀眾及其既定位置的社會交往 (social encounters) 過程中提供道德實踐。博物館可以成為 Simon(2005: 94)所言，「以傾聽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替代性的行動模式)的場所，也就是說，作為「不漠視」(non-indifference)的場域，博物館傾向在傳統意義中擴展行動主義的概念，為個人和集體參與提供多元化的共同行為，如紀念、歷史研究、道歉賠償、和解或諸如政治參與和尋求真相等基本行動。

參考文獻

- Arnold-de-Simine, S., 2013.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Basingstoke.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usby, K., Muller, A. & Woolford, A. (Eds.), 2015. *The Idea of a Human Rights Museum*. Winnipeg, Manitoba: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 Carter, J. & Orange, J., 2012. Contentious Terrain: Defining a Human Rights Museology.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7(2): 111-127.
- Carter, J., 2016. Out of the Box and Into the Fold: Museums, Human Rights,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Gosselin, V. & Livingstone, P. (Eds.), 2016. *Museums and the Past: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p. 243-260. Vancouver, BC: UBC Press.
- Chen, Chia-Li., 2012. Re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raumatic History: A Study of Visitor Comment Books at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7(4): 375-392.
- Crane, S., 2000. Introduction: Of Museums and Memory. In: Crane, S. (Ed.),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pp. 1-1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amo, B., 2003. The Myth of the Vanquished: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American Quarterly*, 55(4): 704-705.
- Huyssen, A. 1995.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 Jelin, E., 2003.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Labors of Mem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hrer, E., Milton, C. & Patterson, M. (Ed.), 2011.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Violent Pasts in Public Place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ontpetit, R., 1996. Une logique d'exposition populaire: les images de la muséographie analogique. *Publics et Musées, Special issue*, Schiele, B. (Ed.), *Les dioramas*, 9(1): 55-103.
- Moses, D., 2012. The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Holocaust' and the Question of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4(2): 215-238.

- Moyn, S., 2010.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yn, S., 2014a. *Human Rights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 Moyn, S., 2014b. A Powerless Companion: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77(4): 147-169.
- Neumann, K. & Thompson, J., 2015. Beyond the Legalist Paradigm. In: Neumann, K. & Thompson, J. (Eds.), 2015. *Historical Justice and Memory*, pp. 3-23.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Phillips, R., 2011. *Museum Pieces: Towar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anadian Museum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Pitt, A. & Britzman, D., 2003. Speculations on Qualities of Difficult Knowledg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Experiment in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6(6): 755-776.
- Schäfer, S., 2008.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and its Exhibition. In: Saaler, S. & Schwentker, W. (Eds.), 2008. *The Power of Memory in Modern Japan*, pp. 158-161. Folkestone, U.K.: Global Oriental.
- Simon, R., 2005. The Touch of the Past: The Pedagogical Significance of a Transactional Sphere of Public Memory. In: *The Touch of the Past: Remembrance, Learning, and Ethics*, pp. 87-10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imon, R., 2006. The Terrible Gift: Museum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ope without Consolat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1(3): 187-204.
- Simon, R., 2011a. Afterword: The Turn to Pedagogy: A Needed Conversa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In: Lehrer, E., Milton, C. & Patterson, M. (Eds.), 2011. *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 Violent Pasts in Public Places*, pp. 193-209.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imon, R., 2011b. A Shock to Thought: Curatorial Judgment and the Public Extinction of 'Difficult Knowledge'. *Memory Studies*, 4(4): 432-449.
- Witcomb, A., 2013.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ffect in Producing a Critical Pedagogy for History Museum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8(3): 255-271.
- Witcomb, A., 2015. Toward a Pedagogy of Feeling: Understanding How Museums Create a Space for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Macdonald, S. & Rees Leahy, H. (Eds.),

2015.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and Sons.

Williams, P., 2007.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Oxford: Berg.

網路資料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網站，About Us，檢自：
<https://humanrights.ca/about-us>（瀏覽日期：2019年3月13日）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網站，Mandate，檢自：
<https://humanrights.ca/about/mandate>（瀏覽日期：2019年3月14日）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網站，Our History，檢自：
<https://humanrights.ca/about/our-history>（瀏覽日期：2019年3月14日）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網站，Renowned Canadian artist to create major original piece for CMHR，檢自：
<https://humanrights.ca/news/renowned-canadian-artist-to-create-major-original-piece-for-cmhr>（瀏覽日期：2019年3月15日）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 網站，檢自：<http://www.fihrm.org>
（瀏覽日期：2019年3月16日）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網站，Museum History，檢自：
http://hpmmuseum.jp/modules/info/index.php?action=PageView&page_id=67&lang=eng（瀏覽日期：2019年3月17日）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5. *Honouring the Truth, Reconciling for the Future: Summar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檢自：
http://nctr.ca/assets/reports/Final%20Reports/Executive_Summary_English_Web.pdf（瀏覽日期：2019年3月16日）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網站，Take Action，檢自：
<https://www.ushmm.org/confront-genocide/take-action-against-genocide>（瀏覽日期：2019年3月16日）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網站，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s New Exhibit from Memory to Action，檢自

<https://www.ushmm.org/information/press/press-releases/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s-new-exhibit-from-memory-to-action-> (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6 日)

財團法人亞洲・太平洋人權情報中心・Liberty Osaka: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o All ,
檢 自 : <https://www.hurights.or.jp/archives/focus/section2/2009/09/liberty-osaka-promoting-human-rights-to-all.html> (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